

# “末代秀才”詹鸣铎与《振先杂稿》的学术价值

朱 红 王振忠

**摘 要** 婺源“末代秀才”詹鸣铎（1883—1931），享年虽仅四十九岁，但在其不到五十年的生涯中，中国社会历经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此一“天时日变其旧，人事日趋于新”的时代，詹鸣铎除了著有章回体自传《我之小史》之外，还有个人诗文集《振先杂稿》和詹鸣铎日记等传世。本文即聚焦于抄稿本《振先杂稿》，从商业、宗族和村落及乡绅角色三个侧面入手，探讨该书的学术价值。从中可见，作为一名“贾而好儒”的生员兼徽商，詹鸣铎虽然衣食无忧，但多年徘徊于功名与生计之间，亦时感步履维艰。在断续的外出游历中，詹氏在江南各地见过世面，也接触到一些新的思想。在其行文措辞中，时常将当年颇为时尚的新名词嵌入个人表述，显露出与时俱进的倾向。不过，从总体上看，他的知识储备与社会见识仍然极为保守，对于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充满了消极与悲观，从中反映出在时代变迁大潮中日益被边缘化的乡绅之无力与茫然。

**关键词** 徽州 婺源 詹鸣铎 乡绅 《振先杂稿》

作者朱红，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 200235）；王振忠，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上海 200433）。

中图分类号 K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0)11-0168-11

2002年，承婺源友人的帮助，本文作者之一王振忠意外发现徽商詹鸣铎撰写的章回体自传《我之小史》<sup>①</sup>。该书内容从清光绪九年（1883）迄至民国十四年（1925），逐年记录了一个徽商家庭的社会生活。自传抄稿本计有二种，总字数分别皆近二十万言，是目前所知徽州历史上唯一的一部由徽商撰写、自叙家世的小说，对于明清以来中国历史和文学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类似于此长达四十余年、多达二十万字的连续记录，在以往的徽州文献中尚属首次发现，从这个角度来看，该书的发现，是近十数年来徽州民间文献收集中最为重要的一次收获。

据相关文献分析，《我之小史》一书至迟当完成于1927年。自传的作者詹鸣铎（1883—1931）是清代徽州府婺源县北乡十三都庐坑下村人，其人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考中生员，迄今在婺源当地，还被人们称为“末代秀才”。詹鸣铎出身于木商世家，其人的阅历颇为丰富：他当过乡村塾师，中过生员，到过杭州、石门、上海等江南各地经商、游历，所到之处，出入花街柳巷，进过新式学堂。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以乡绅身份在庐坑当地的邻族间排忧解难，并积极参与晚清婺源乡间的地方自治。自己又一度在婺源开设振记百货店，但因不善经营，亏空甚多。

<sup>①</sup> 詹鸣铎著，王振忠、朱红整理校注：《（新发现的徽商小说）我之小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关于《我之小史》一书的学术价值，葛兆光撰有《本无畛域——从〈我之小史〉说到资料的解读》，《读书》2008年第5期；朱万曙：《近代徽商自传小说〈我之小史〉的价值》，《江淮论坛》2012年第2期。

多年前，我们合作整理、出版了詹鸣铎所撰的《我之小史》。不过，有关其人的文献史料，尚有未刊的《振先杂稿》及詹鸣铎的4册日记稿本，亦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关于《振先杂稿》，目前所见的抄稿本计有6卷，即卷1、卷2、卷3、卷4、卷6和卷8，其编排顺序基本上是以年代为主。此处即聚焦于《振先杂稿》一书，探讨其多方面的学术价值。

## 一、从《振先杂稿》看清末民初徽商的贸易经营

詹鸣铎出身于商人世家，但他作为“末代秀才”，更为向往的似乎是乡绅文人的社会生活。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九岁的詹鸣铎随祖母赴杭州，他在《江干夜话》一诗中写道：“莫道余心惰，还期志早酬，纵经呼负负，敢自听休休。铜臭羞凡辈，书香冀我侪，儒冠应弗误，不必太多愁。”<sup>①</sup>在他眼中，计觅缙绅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职业，故而终其一生，始终缺乏足够的经商热情。1916年，詹鸣铎曾附鼎隆布店股东，且身入煤油公司从业。1917年，因煤油公司亏蚀，另易股东，他遂延请中人向鼎隆拆股，独立振记洋货营业，随即租兴孝坊程宅店屋正式开张<sup>②</sup>，并自称“洋货生员”。对此，《振先杂稿》中有一首打油诗《兴孝坊即事》：

兴孝坊街洽比邻，沧桑变幻一时新，钱庄枉负大爷号，药栈徒将空屋陈。鸭蛋店中怀淑女，猪屠铺内宴嘉宾，莫嫌市井多尘气，洋货诸生纸举人<sup>③</sup>。

婺源兴孝坊是詹鸣铎开张振记洋货店的场所，该诗状摹了其人开店期间的种种佚事，这在《我之小史》中有颇为细致的描述。当时，振记虽以生意为名，但店中平昔“弦歌不辍，经商之道，全不考究”。在开店期间，詹鸣铎曾参加县城曲堂——三乐堂，学唱二花脸，兼习二胡越经，并出堂三次。又借董亦衡住宅前门为乩坛——诚感坛，坛供吕大祖师。在漫不经心的三年之内，振记亏款甚巨，一再迁址，统共蚀去1500余银元。后来振记又迁至昌吉提庄隔壁，忙于拍卖陈货。1920年，婺源县城的振记店事终于收歇。

除了在婺源县内的活动外，出自木商世家的詹鸣铎也时常外出，参与或独立主持木业经营。从《我之小史》的描述来看，詹鸣铎之父詹蕃楨以及兄弟等皆从事木业贸易。光绪三十三年（1907），二弟詹耀先在庐坑家中经营木业多年，具有相当的规模。三弟礼先随其父在杭州钱塘江滨的江干木行经商，一直到光绪三十四年自杀为止。四弟绍先曾入杭州的木业学堂，这也是为后来步入木业界做准备。而詹鸣铎之子詹志善，于1918年4月前往浙江练市镇阜生木行为徒。后来，又进入湖州朱吉记木行“学习木业”。至于詹鸣铎本人，也有很长一段时间皆在木行内谋生。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父亲詹蕃楨来信，命他前往杭州学做生意。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詹鸣铎又奉父亲之命，前往练市镇的阜生木行，“司理账目。闲居无事，谙练木业行当，凡龙泉码子、木业市语，以及推游水图并清排本等之装排式，抄得一本，不时披阅。故司内账缺，而于卖木卖板之事，兼营并务”。由此可见，当时詹鸣铎抄录了一册包括龙泉码子在内的商业书，时常翻阅以熟悉相关业务。1920年，祖母谆谆告诫詹鸣铎，“谓浙江木业，为全家命脉”，命他前往浙江，与同胞兄弟共同经营木业。翌年，詹鸣铎就任阜生行经理，所往来者，亦多木业同行。

正是因为这些经商的阅历，使得《振先杂稿》中的一些论述多与婺源木业相关。如1924年元月《代贺大来木行开张》：

大道生财，川流不息。来章庆誉，日起有功。广大高明，日宣三德。沓来纷至，云集万商。大厦良材，声名鹊起。来源活水，利益骈臻。豫大丰亨，卜云其吉。熙来攘往，利有攸归。

这皆是四字吉语，用以诠释木行之名称及其商业内涵。文中的“来章庆誉”，典出《易经》<sup>④</sup>。此外，詹鸣铎还有《代撰贺永大昌开张》《公贺永春祥湘记开张》《公贺利兴宝号开张》《贺恒兴号开张》《代贺乾兴开张》和《又代寿松贺利兴》等，这些，都反映了他与相关商号之应酬与交往。

此外，詹鸣铎还为亲朋好友写过不少行述、传记，其中亦不乏反映徽商活动的史料。譬如，詹鸣铎的

①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1。

② 詹鸣铎：《（新发现的徽商小说）我之小史》续第二回《往邑城带儿就学，赴杭省携眷闲游》，第307页。

③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4。

④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6。

父亲是名婺源木商，在《振先杂稿》中就有《先大夫蕃桢公行述》<sup>①</sup>，其中提及詹氏家族先祖的经商情形：“先高祖（詹逢荣）天性浑厚，事亲不遗余力，营木业于毫。尝自豢鸡，归以遗母，肥大无匹，时人称为孝子鸡。后以水灾负金而走，竟被溺毙。”根据清乾隆年间编纂的《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等的记载，明清时代庐坑詹氏经营木业的一个重要据点是在安徽亳州（即今亳州市）。从中可见，庐坑詹氏迁居亳州等地，至迟自明代中叶即已开始<sup>②</sup>，他们在当地主要从事盐业和木业。

除了亳州之外，景德镇也是庐坑詹氏最为活跃的重要市镇。詹鸣铎之曾祖幼孤，长大后在族人的帮助下，“釀金兴创南货业于昌江……一蹶再振，坐享赢余”<sup>③</sup>。“昌江”在江西浮梁县南门外，亦名大河或北河，该河自徽州祁门县流入浮梁县，此处是以“昌江”代指景德镇。到了詹鸣铎之父詹蕃桢时，“贸易钱江，经营木业，既忧劳之兼尽，亦勤俭以支持。惟思辛劳一生，为谋利藪”。<sup>④</sup>换言之，从詹蕃桢开始便在杭州等地经营木业。

从《我之小史》的描述来看，詹蕃桢于光绪二十年（1894）在浙江石门与著名官绅江峰青合开德昌隆木号。两年后，他又与后者在杭州江干合立隆记木行。詹鸣铎认为，父亲的经商之道中最重要的成功秘诀便是“勤俭”二字。对此，他以亲身经历举例说明——“不孝时年十二岁，随府君往。记得由杭江干步行至万安桥，由万安桥趁夜航船至石门，其苦不可名状。盖府君一生勤俭，习惯已成自然，有如是者。府君之经商也如变把戏，然出没不测如睹跑马然，陵厉无前，而其唯一之宗旨，则不外勤俭二端。尝谓生意者，意由人心中以生，故做生意谓之权子母，母以生子，生生不已，而生财之道在是矣。操此以往，故三年之内，德昌隆木号蒸蒸日上”。光绪二十七年（1901）以后，詹蕃桢又在练市镇开设了阜生木行。

在詹氏家族中，类似于詹蕃桢这样的徽商还有不少。光绪三十三年（1907），詹鸣铎还撰有《叔高祖逢怡公行述》：

叔高祖詹姓，讳逢怡，字汝和，先叔高高祖隆垵公子也。自隆垵公弃养，抱恨终天，幸得荻教殷勤，赖以成立，故事母不遗余力，乡党宗族，人无间言。奈家贫，贸易武昌，冀获鸡豚之奉。未几，以发逆之乱，命驾旋归……中年迭生五子，食指日繁，乃不得不谋生计，于是改辙乐邑，茶木经营，数十载水宿风餐，险阻艰难，备尝之矣。至向平愿了，乃为五子分炊，使之分门别户，各图自立。

詹逢怡先是前往湖北武昌经商，其间因太平天国时期的兵燹战乱，只得返乡避难。后来因生计所迫，又不得不再次外出，在江西乐平从事茶、木经营。明清以来，“婺水汇来通赣水，西江月似故乡明”<sup>⑤</sup>，江西乐平是诸多徽商尤其是婺源商人麇集鳞聚之处。所谓向平愿了，典出《后汉书·向长传》，是比喻子女婚嫁事皆已完毕。

除了徽商的传记之外，詹鸣铎还写过不少商人妇的行状。例如，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撰写了《代耀明述母王氏孺人行状》：

孺人王姓，闺讳茂枝，王村五品街王钧衡璇之次女也。父早世，门庭冷落，日就穷困，赖母教养。十二龄以衣食难给，小嫁吾门，配先显考登仕佐郎喜苗公。维时妯娌四，孺人居末。先大父逢智公经营遂意，稍获赢余，奈先王母撑持家计，以勤俭为先，故妯娌四人，日食粗粮，未尝饱也，而于孺人为甚。及合卺后，仍然井臼亲持，灌园抱瓮，终岁劳苦者，匪伊朝夕矣。

“孺人”原是古代对官员之母或妻子的封号，但在徽州则成了一般妇女的称呼，通常与称呼男性之“朝奉”相对应。对于王茂枝，詹鸣铎自称“再姪孙”。所谓小嫁，亦称“小过门”或“小娶”，也就是童养媳的习俗。根据先行的研究，在明清时代的婺源，送养及收养童养媳，已积淀而为当地的一种民俗，是以“俭啬”著称的徽州人对于生活的一种“理性反应”，它与男人外出经商、女人提供家内主要劳力的徽州社会生活密切相关。<sup>⑥</sup>

①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3。

② 《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乾隆四十九年（1784）梁岷跋。

③ 詹鸣铎：《先大夫蕃桢公行述》，见《振先杂稿》卷3。

④ 詹鸣铎：《自为先严及三弟孤疏（先严周年日）》，见《振先杂稿》卷4。

⑤ 詹鸣铎：《到乐平》，见《振先杂稿》卷4。

⑥ 王振忠：《徽商章回体自传〈我之小史〉的发现及其学术意义》，《史林》2006年第5期。

1930年，詹鸣铎又撰有《代丁当庆撰时婆行述》：

宜人姓洪氏，闺讳时好，官源洪济美公第五女也。温柔敦厚，幼谙姆训，年十三，归我父。维时有先曾祖母及先祖父、先祖母，宜人先意承志，食性早谙。及十六合卺，同心黽勉，旦戒鸡鸣。严君驰骋商场，与昆弟辈协力同心，逐什一之利。其中铢积寸累，经营发达，一生无内顾之忧者，皆得我宜人内助之力……<sup>①</sup>

按照通常的惯例，明清两朝称五品命妇为“宜人”，而在婺源民间，似乎是因其子孙稍有功名，便可称为“宜人”。同年撰写的《代撰民婆行述》亦提及：

孺人姓余氏，闺讳民娟，沱川篁村余公渔洲之女也。生有淑德，闲静幽贞，父母尝钟爱之。年二十，于归家君，敬戒无违。时堂上重慈健在，孺人服劳奉养，难得欢心，而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家君英年读书，下帷攻苦，孺人寒灯佐读，期望良殷。自国家诏停科举，家君改变方针，其初茶业经营，后于昌江创设公益南货基业。孺人支持家政，井井有条。累年以来，克勤克俭，俾家君一意营业，无内顾之忧<sup>②</sup>。

此一行述中提及因清末朝廷废除科举，余民娟之夫只得弃儒从商，先是从事茶业经营，后又前往景德镇创设公益南货店。1930年，詹鸣铎又为族人詹寿松代撰其母《定婆行述》：

孺人姓汪氏，闺讳定好，莘源汪理荣公第四女也，温恭淑慎，幼谙母训，年十九，始出阁，于归严父，顺从有道，敬戒无违。维时堂上先曾祖、妣及先大人王利祖母俱在，孺人先意承志，能得两代欢心。先大夫牵车服贾，后于昌江创设恒茂南货基业。自赣言归，见居室湫隘，因造西南余屋，一时鸠工庀材，家事忙碌。孺人和妯娌行分任其劳，遇事争先，惟恐不及，而饮食则推肥守瘠，礼让自持。及戊申，胎经堂翻造，一切仍旧，孺人内外兼顾，靡有不周。严父从二兄贸易昌江，孺人在家支持家政，井井有条……<sup>③</sup>

这同样也是一位商人妇的相关行述，其中提及其夫在景德镇创设恒茂南货店。这些都说明，婺源商人与江西乐平、景德镇的关系最为密切。

纵观上述的相关行述，在对商人妇的描述中，诸多情节皆是为了凸显徽州乡里盛称的“抱瓮灌园”及“井臼亲持”诸“女德”。所谓“抱瓮灌园”，是比喻安于拙陋的淳朴生活；而“井臼亲持”，则典出《后汉书·冯衍传下》，亦作“井臼亲操”，主要是指汲水、舂米等家务皆亲自操持。之所以如此刻意表彰，是因为许多徽州人皆希望这些商人妇的事迹能有机会被方志收录，列入“节孝”以光宗耀祖。例如，《我之小史》续第四回就抄录了詹鸣铎祖母去世时所发出的一道哀启，文中对其祖母的一生作了概述，末曰：“其懿行载诸志乘，见五十二卷《节孝传》”这里的“志乘”，是指光绪八年（1882）刊行的《婺源县志》。而从目前所见的方志卷52《列女四·人物十五》来看，此一传记是“壬午新编”，也就是光绪八年刚刚采辑而来的事迹，其原始来源显然也就是哀启、行述之类的文本。

值得注意的是，在为商人妇列传时，詹鸣铎的撰述亦颇为与时俱进。在这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宣统三年（1911）他代族人詹起庸撰述的《母氏行状》：

孺人汪姓，闺讳酥娟，莘源国学生汪讳德之遗女也。洪杨起义时，未出阁，而心理所及，有木兰之思想，说者许为英雄。二十四岁归为严父，性质强硬，然其对于翁姑则极和平，且自尽其孝养之天职。按彼时泰西学术，尚未灌输我支那。孺人未受一经，而其程度之高，则大半有合于今日之维新者。故家族平权，对等地位，非眼光所能及，实能力所伸张，人谓其领袖河东，而不知其唱随之间，有特别之感情，辄无野蛮之对付也。论严父驰逐商界，而孺人自治家政，层次井井，外与乡党邻里，从无竞争，惟有侵越其范围者，则出其手段以抵制焉。至于和妯娌，则爱慎真挚。其能合群，抚儿女，则教化自由，而不尚压力，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耳。去岁得痲疾，自知不起，不孝侍诸卧榻之侧，尝谓之曰：儿等亦知二十世纪之中华比例于各国者惟文字为优点乎？虽然德行、言语、政事，非文学而莫传，不可忽也！彼市侩村町，气类相感，凡有庆吊而人文不兴焉，母实耻之！母死之后，儿其欢迎文学家铭之墓志，传之家乘，则母不死矣。大哉斯言！最近来新发明之新理论也。

在这段文字中，詹鸣铎堆砌了不少新名词，最后还刻意写道：“当代上等文明社会，锡之铭谏，以阐

①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8。

②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8。

③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8。

幽光，则不孝世世子孙，感且不朽。”从该份行状来看，传主实际上是位性情刚劲的女汉子，而詹鸣铎则在“性质刚硬”之后注曰：“夫夏廷来求作行述，教其事实，口称其刚劲。余笑不绝口，谓妇人以柔顺文明见德，恶有所谓刚劲者？不得已如以‘性质强硬’四字代之。”<sup>①</sup>为此，詹鸣铎在行状中将传主汪酥娟称为“英雌”、河东“领袖”，并将“平权”“对等”等时髦语汇加诸其身，力图将传统的商人妇包装成时代风云中的新式人物，颇显滑稽。

## 二、詹鸣铎与庐坑之宗族、村落建设

除了外出游历和经商之外，詹鸣铎大部分时间是在婺源庐坑村内活动。庐坑是詹氏在江南的始迁地，在村内建有绿树祠。作为宗族社会的一分子，詹鸣铎在庐坑村内积极参与乡族的各类活动。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族人詹玉屏捐输创设团拜会，为此，詹鸣铎撰有《团拜会序》，指出：“团拜一会创自前人，取一团和气之意，世世相承，历久弥新矣。特年来度支日绌，瓶罄贻羞，不早绸缪，何以善后？……鸣铎等遵祖考之彝训，率先人之旧章……所愿我房支众尔炽尔昌，麟趾呈祥，螽斯载咏，则本会亦大有荣施焉尔。”宣统元年（1909），族人詹镜泉组织清明扫墓的飘挂会，詹鸣铎为之代撰《组织飘挂会启》<sup>②</sup>。

除了日常的团拜、祭祀活动之外，詹鸣铎还参与宗族的一些管理活动。五老为庐源来龙发脉，村荫攸关，1925年，因有人私往开窑，詹鸣铎遂作《公禁五老开窑禁约稿》，由庐坑绿树祠严申禁约<sup>③</sup>。庐坑詹氏世德堂（即今日尚存之“世天官第”）健公支下，原有八大房子孙，后因凌夷衰微，只剩下长、三、六、八四房。而这四房中，又以长房敦字号丁多势盛，再加上累代丰厚，一直由长房控制着世德堂的财务。随着时代的变迁，经管者侵蚀日多，引发族人之不满，遂酝酿大规模的重整规章。为此，1925年，詹鸣铎作有《世德堂善后筹备处全立合墨稿》《世德堂善后筹备处启》《祠事整理存底序》和《世德祠恢复祀产一周纪念》等文<sup>④</sup>，并撰述了《恭代祖先训词》：

忧劳勤俭，罔有不臧，淫逸骄奢，靡或不亡。天相吉人，俾寿尔富，贻我子孙，亦孔之固。缅怀世德，垂裕后昆，祖考彝训，罔不率从。乃祖乃父，既明且哲，用迪前光，克绍先烈。自时厥后，旋败旋兴，振振孙子，乐观厥成。何期光绪，三十四载，付托非人，祀产莫保。自今伊始，改弦更张，彝伦攸叙，祖泽孔长。贻厥孙谋，以燕翼子，初哉首基，慎终于始。天心助顺，人事转机，无俾太怠，公尔忘私。毋争尔功，毋贪尔利，攘臂争先，谋无不遂。毋丧尔德，毋败尔名，和衷共济，众志成城。毋灰尔心，毋惰尔志，发愤为雄，淋漓恣致。今日纪念，计期一周，蒸蒸日上，永孚于庥。有明崇祯，几于腐败，继起有人，用光乃德。咸丰八载，各饱私囊，幸图恢复，载锡之光。从此振兴，先承世业，辉映后先，若合符节。于万斯年，聚族于斯，子子孙孙，勿替引之。

文中提及世德堂之祀产从明末崇祯迄至晚清光绪年间，因其间曾所托非人，产生了很多的弊端。在此背景下，詹鸣铎与族中的一些人负责重新加以整顿。

除了詹氏宗族的内部事务之外，大小姓纷争也是因扰传统徽州的重要社会问题。关于这一点，詹鸣铎在《我之小史》中曾有描述：

我们詹家大族，祖宗昔日有九姓世仆，抬轿子，吹喇叭，张姓在内。听得前辈人说：道光年间，为行乡人馆的故事，他们做神近于戏的戏，有无礼犯上之举动，公议惩戒，开绿树祠责打屁股。论王道本乎人情，蒲鞭示辱，本可将就了事。有新建官哩，偏说屁股打轻了，要重新打过，二次又开绿树祠重重责打。不料嫉恶太严，事反变本加厉，张仆因此叛变，呈办无效，以致九姓的世仆一齐跳梁。

所谓跳梁，在清代以来徽州的语境中，是特指世仆、小姓摆脱主家或大姓控制的行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詹鸣铎前往徽州府参加府试。因九姓世仆中张姓四人混考武童，双方发生纠纷。詹氏宗族决定

①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4。

②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3。

③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6。

④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6。

将庐坑村内的各清明会祀停胙，以筹措讼费。詹鸣铎等五人公议寻找讼师代写禀帖，连名指控张姓四人混考武童，结果得以如愿以偿。<sup>①</sup>除了通过诉讼解决纠纷之外，詹氏与庐坑周遭的小姓之纷争，有时也通过械斗加以解决。根据詹鸣铎的看法，西山余姓也是詹氏原先的九姓世仆之一，他们亦脱离庐坑主姓控制多年，双方渐至势均力敌。1912年，詹鸣铎撰《代碧茂告族众启》：

西山余姓逆仆，跳梁至今，横行已久，近更明目张胆，恣意行凶。身住宅来龙荫木，曾经堂谕封禁，乃逆仆纠合多人，故意砍伐，并敢殴伤舍侄头脑，流血如注，媳妇亦被棍伤，甚且大肆炎威，擅行乱打，阖族耻之。今身为保祖荫，自愿破家荡产，以雪此仇。为此先将祀租变卖，此外或求热心君子，量力捐助，以期众志成城。夫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彼奴隶种族，尚结野组团体。况我素称望族，人文蔚起，代有人顾，可各怀异心，秦越相视？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凡我族众，宜如何体恤矜全，共扶大局焉。<sup>②</sup>

碧茂属詹氏之八房，根据《我之小史》的记载，他有坟山下塘坞，该山荫木屡被西山人盗窃。有一次，碧茂登山捉获盗砍的西山人，结果对方不服，反与之斗殴，并且纠合西山人全体上山大肆砍伐。碧茂侄荣富大愤，延自治会于世德堂，呼西山人前来对质，但不得要领。结果双方只能对簿公堂，亦无法彻底解决<sup>③</sup>。后来又因西山下余姓强斫荫木，并打伤碧茂侄辈荣富，引发詹姓全族的愤怒，遂集合宗族全力与西山下械斗，攻入后者村内，将其“所蓄养的池鱼十一塘，一扫而空”<sup>④</sup>。

这些史料中描述的大小姓纷争，涉及地域社会中村落之间的彼此关系。在明清时代，“里至源头，外至水口”是大姓村落的重要标志，尤其是水口，成了宗族加强自身建设的重点所在。1927年，詹鸣铎撰有《西水东流小引》：

语云：“西水望东流，富贵弗断头。”诚以东方生气，万派朝宗，波流澎湃，必归一于此矣。我村龙川，水口环合，妙景天然，始祖黄隐公肇迁，聿来胥宇，讲理学者，相厥山川，广培元气。有亭，有塔，有月塘，源头活水，汨汨乎来，盖有取乎西水东流之意。地灵人杰，昔人每概乎言之。今则物换星移，甘泉告竭，爰集众公议，重新整理，挹彼注兹，并修月塘，用萃财源。俾之西水东流，即富贵亦可以垂诸永久。一村之福，何快如之！<sup>⑤</sup>

从风水的角度来看，水口关乎村落、宗族之盛衰，徽州民众时常通过引水补基、障空补缺，营造出符合堪舆学理想模式的人居环境，以期荫护村落和宗族的发展。除了此类传统的观念意识之外，一些新知识也逐渐影响到了当地人的思想。例如，詹鸣铎就有《读〈家庭实业报〉感言》：

极地球九万里，穷宇宙五大洲，林林总总，攘攘熙熙，所恃以养民之本，而惟致富之源者，其惟家庭实业乎……盖讲大实业，兴大工厂，资本维艰，不如就近家庭，各谋工艺，尚易为力<sup>⑥</sup>。

清末民初，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实业救国”思潮在中国兴起，一些有识之士主张以工商立国，反对重农抑商，要求以资本主义工商业取代传统的小农经济。詹鸣铎显然受了此一影响，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图在庐坑村将之付诸实践。在《试办开垦公司》一文中，詹鸣铎就指出：

……新安有大好山水，歌哭于斯者，服膺食德，读《无逸》之篇，披《豳风》之图，乐利蒸蒸，洵足以自食其力。然我婺源多田少，稻麦而外，尤非种山不为功，闲尝口巉岩，披蒙茸，见夫千岩万壑，一带荒芜，人生习为固然，恬不为怪。而彼贫民，乃挽粟飞刍，罗雀掘鼠焉。夫赤地千里，谓之无地，脱若长此终古，弗思开通民智，善自为谋，斯累累之黄金，掷诸虚牡[牝]，良足深惜！……鄙人有鉴于此，独居深念，思欲共结团体，兴表同情，组织一开垦公司。其经费则共同酌筹，其规则则公同磋商，开办之后，必使地无旷土，人无弃才，绝其致乱之源，谋我自强之术……<sup>⑦</sup>

文中的“共结团体”“共同酌筹”和“公同磋商”等字眼，反映了在激荡新潮裹挟下，詹鸣铎于桑梓故里所做的一番努力。在婺源，木业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至南宋。特别是明清以来，婺源木商更是蜚声远

① 詹鸣铎：《（新发现的徽商小说）我之小史》第六回《王母大闹隆记行，詹家全控逆仆案》，第133—137页。

②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4。

③ 詹鸣铎：《（新发现的徽商小说）我之小史》第十七回《从众劝因公往邑，小分炊仍旧训蒙》，第265—268页。

④ 詹鸣铎：《（新发现的徽商小说）我之小史》第十九回《悬横额别饶静趣，剪辫子鼓吹文明》，第291—292页。

⑤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6。

⑥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6。

⑦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3。

近。在新思潮的影响下，詹鸣铎主张在庐坑开设永振林业公司，不仅开垦，同时培育，开其利源，“凡我村内，上自前山插角，下至龙川桥边，旁及琥珀山、葛岭，邻将军庙、五谷仙，皆在范围之内，均当一律保护，毋许斫伐，毋许焚烧，以期日后培植成林，大收其效”<sup>①</sup>。

在晚清民国时期，詹鸣铎曾在庐坑村中设帐教读，在《杂感》一诗中，他颇多感慨：“世道人心变，村风尔荡口，只缘凭祖荫，难得择邻迁，纷难空排解，纲常独口肩，一乡宜表率，可惜尚青年。”一开始，詹鸣铎活跃于庐坑乡间，颇感踌躇满志。根据《我之小史》的描述，詹鸣铎曾声称：“在下一个书生，寒窗苦读，平日对于族内虚怀若谷，原未尝以乡绅自居。自乙巳入洋至今（己酉）五载，村人每求行状，请题红，我亦屡为之。若夫乡邻有斗，约族众调和，我亦忝居其末。投词告理的，亦每到我家来。”<sup>②</sup>文中的“乙巳”，也就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詹鸣铎于该年成了生员；“己酉”亦即宣统元年（1909年）。由于詹鸣铎具有生员身份，故在庐坑村中有着一定的地位。他曾为“保痘戏”<sup>③</sup>“新年社戏”撰写了联匾，为“十三灯会”拟写了汪帝祝文<sup>④</sup>，为王大真仙迎神赛会拟写了联匾及出巡通告<sup>⑤</sup>，代外横坑撰募捐赈灾启<sup>⑥</sup>，并应族人之邀为婺源虹关镜心坛重修浙岭撰写募捐启<sup>⑦</sup>……1915年，村内社庙开光，继办大庙开光，詹鸣铎列居八位总理之一。从《詹鸣铎日记》来看，詹鸣铎经常为村内外的亲朋好友撰写各类对联、疏文等。而在《振先杂稿》中，就收录有不少婚丧冠祭等日常应酬方面的文章。根据此前的统计，从《振先杂稿》来看，詹鸣铎所撰各类疏文计有43份，写过的其他婚、丧、祭文、对联等也相当之多。

### 三、剧烈社会变迁中的徽州乡绅

光绪三十二年（1906），“时国家诏停科举，起学堂”。对此，《我之小史》第十三回也提及：“会朝廷颁行新政，各省创立学堂，邑尊魏公又复照会，村内遵旨开设初等小学，照会中共八人，我又其一。幸丙生领袖开办，大家安享其成，学长虚衔，且填我名报告。”<sup>⑧</sup>为此，詹鸣铎作《各省奉谕创立学堂诗以颂之》：“学界文明遍地球，独吾黄种敢悠悠”，“圣朝通变改新章，各省纷纷建学堂”<sup>⑨</sup>。当时，在学部的主持下，各省贡院纷纷改为学堂。在此背景下，詹鸣铎也“以蒙馆一事，不合时宜，因谢散学生”<sup>⑩</sup>。

晚清民初，徽州乡间烟赌盛行。詹鸣铎即有《烟鬼》诗：“黑籍冤魂剧可怜，何堪往事已如烟，云蒸霞蔚偏成癖，铁骨铜筋尽化棉。一盏迷灯遮日月，半张残榻误华年，记曾香雾空蒙里，鬼魅争光在那边。”又有《赌鬼》诗：“倾囊输尽典春衣，回首生前计已非，喝六呼么情放浪，成群结党记依稀。顿令白璧光阴失，忍见金钱蛱蝶飞，地下若逢豪赌友，自惭财力与心违。”<sup>⑪</sup>诗中状摹了吸烟、赌博令人生不如死的惨状，从中可见，其时烟、赌已成为婺源民间社会的痼疾。对此，宣统年间，詹鸣铎曾以庐坑五六段自治会的名义，撰写了《自治会戒烟文》：

方今朝廷变法，百度维新，三令五申，尤以禁烟为第一义。本会遵示，业经严禁。近更奉邑尊颁到新刑律，中载鸦片烟罪，言之且详。为此再行广告，俾众周知：凡内外人等，各宜守法奉公，怀刑自爱。未犯者慎防失足，既犯者亟早回头，总期扫尽廓清，勉为善类。用俾鸦片流毒，淘汰天然，地方幸甚！社会幸甚！<sup>⑫</sup>

当时，詹鸣铎在庐坑村内安砚课读，重执教鞭。受县令委派，负责办理调查户口、开设初等小学等

① 詹鸣铎：《庐源永振林业公司启》，见《振先杂稿》卷6；参见同卷《庐坑永振林业公司通告》。

② 詹鸣铎：《（新发现的徽商小说）我之小史》第十三回《办自治公禀立区，为人命分头到县》，第211页。

③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6。

④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4。

⑤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8。

⑥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6。

⑦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6。

⑧ 詹鸣铎：《（新发现的徽商小说）我之小史》第十三回《办自治公禀立区，为人命分头到县》，第212页。

⑨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2。

⑩ 詹鸣铎：《（新发现的徽商小说）我之小史》第九回《迎新学五门道贺，探双亲七夕到杭》，第174页。

⑪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6。

⑫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4。

事。其时，詹鸣铎受聘担任学长，先后担任庐坑村五段调查员、五段段董等职。宣统二年（1910），詹鸣铎又与村人詹韵锋诸人借凌云阁为庐坑自治公所，拈阄造册，凡十二人，轮流司月，立自治筹一枚，谓之文明团体。

宣统三年（1911），湖北武昌起义，四方响应。婺源则奉机关部文暂时独立。当时，著名官绅江峰青由江西审判厅回到原籍，成为婺源的中流砥柱，当地官绅公留原县令魏正鸿维持现状，“四乡赖以不乱”。对此，《我之小史》描述：“那时各省光复，各处土匪，乘间窃发，乡间地方，人人畏惧，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婺源宣告独立之后，并令各乡筹办民团，用防土匪。我与宝书、锦屏等极力组织，乃开局于绿树祠，宝书委我为书榜文，我走笔应之”<sup>①</sup>，其后所列的《自治局公办民团榜文》，就直接抄自詹鸣铎的《振先杂稿》卷4：

方今烽烟四起，羽檄交驰，奉本局奉临时机关部文，筹办民团，为保治安起见，业经公同议定，以本月初一为起点，自今伊始，开局堂皇。凡我各村，理宜协力同心，守望相助，夜间派巡士到处巡缉，用防疏虞，是诚当务之为急也。惟责分事举，职有攸归，法久弊生，事宜善后。今复公同酌定，一切章程各件，遵照办理，作事谋始，有开必先，愿族众同注意焉。

根据另一篇《自治局筹办民团启》记载，当时湖北起义，安徽省独立，婺源县改为临时机关部。自治局是由庐坑村内传统的文会所改组，在此基础上，詹鸣铎等人筹组的民团设有总董一人，“总理局中一切事物”，副董一人“同襄办理”。此外，还有管理员（会计）、监察员、文牍员和庶务员各一人，另有巡士四名、巡更二人。后者命余、汪两姓轮流服役，每夜于十点、十二点、二点和四点定期巡查。但好景不长，因族人内部发生纠纷，詹鸣铎后负气而去，及至该年年终，民团亦作鸟兽散。

鼎革之后，詹鸣铎也殚思竭虑地力图跟上时代节奏。民国元年（1912），他组织文明剪辫大会，以开风气。其间，詹鸣铎撰有《文明剪辫大会广告》，择定三月初二为会期，率众人到绿树祠敬天地、拜祖宗，一律剪去辫子。通过煞有介事的一场仪式，村内剪辫者十之七八，未剪者十之一二。对此，詹氏颇为自豪地指出：“他以为我的为人平日规行矩步，不越范围，村内人最相信的。我若说辫子这东西不可剪，村内人就不剪了；我若说辫子这东西定要剪，村内人就都肯剪了。”<sup>②</sup>这显然是因为詹鸣铎有着秀才的身份，故在乡间的日常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 四、余论

在詹鸣铎的现存著作中，目前所知曾公开刊刻者，仅有清宣统元年（1909）紫阳书院之排印本《冰壶吟草》二卷<sup>③</sup>。“冰壶”是詹鸣铎的书斋之名<sup>④</sup>。对此，詹鸣铎在《振先杂稿》卷1中指出：“余另有《冰壶吟草》付刊，所有呕哑嘲哳、词近鄙俚者均为删去。”<sup>⑤</sup>可见，《冰壶吟草》应是从《振先杂稿》所录诗歌中挑选出一些自认为词句不太“鄙俚者”加以刊行。不过，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视之，正是那些“词近鄙俚者”<sup>⑥</sup>，其实有不少恰恰反映了晚清民初徽州乡土社会的实态。

詹鸣铎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卒于1931年，享年虽仅四十九岁。但在其不到五十年的生涯中，中国社会恰逢翻天覆地的变化。先是废科举，接着是辛亥革命、江浙战争等，新旧交替，一波接着一波。处在这样一个“天时日变其旧，人事日趋于新”<sup>⑦</sup>的时代，因社会剧烈变革，詹鸣铎的内心显然承受着持续不断的冲击。他有《感时》诗，对于国事颇多感慨，其中之一曰：

① 詹鸣铎：《（新发现的徽商小说）我之小史》第十八回《接杭电匍匐奔丧，办民团守望相助》，第286页。

② 詹鸣铎：《（新发现的徽商小说）我之小史》第十九回《悬横额别饶静趣，剪辫子鼓吹文明》，第295页。

③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1的《定情诗》，注曰：“见《冰壶吟草》。”

④ 詹鸣铎：《村居即事》，见《振先杂稿》卷2。

⑤ 詹鸣铎：《别姬诗步原韵（用姬口气作和诗）》，见《振先杂稿》卷1。

⑥ 如《振先杂稿》卷1中的《致襟兄胡选周茂才书》三份、卷2的《寄二弟书》，皆谈及家庭琐事；卷6有癸亥（1923年）五月之日记四页。这些，显然都没有公开出版之价值和必要。

⑦ 詹鸣铎：《庐源永振林业公司启》，见《振先杂稿》卷6。



虎视眈眈环四邻，男儿报国合忘身，登车宜有澄清志，上策何堪痛哭陈。怅望狂鲸今未灭，思量尺蠖几能伸，春秋选帅资谁任，原是敦诗说礼人。

在《感时》诗中，另一首则作：

丈夫七尺肯虚生，努力神州答圣明，倘许隆中先决策，莫教纸上枉谈兵。壮心到此浑难已，大志何年许竟成，但愿风云能净扫，四夷宾服庆升平。

即使身居僻野荒陬，他的内心也充满了大丈夫报国的壮志雄心。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去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对此，詹鸣铎撰有《哀胶州》诗：

戍楼东望烟尘黑，日兵奋迅如霹雳，羽书昨夜过登莱，日兵已及胶州北。  
哀哉胶州作战场，枪林弹雨何茫茫，闻者寒心色沮丧，天地为之竟低昂。  
痛念胶州我领土，版图自昔隶东鲁，青岛曾租与德邦，通商立约群安堵。  
何期战事始欧洲，兵端一起震全球，日人乘机索青岛，旋教祸事到胶州<sup>①</sup>。

关于兵灾对山东社会的影响，他也有着深切的感喟：“故乡遥望荒凉甚，玉石俱焚同一烬，家人羁旅各西东，颠沛流离谁问讯。同是同胞我弟兄，兵灾何忍使流行，为怜扶老兼携幼，烽火连番满路惊。”在这些诗歌中，他时常表现出对于国家兴亡之忧虑，偶尔亦迸发出颇为强烈的爱国热情。

1918年大战结束，德国战败。翌年1月，列强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与会的中国代表在舆论压力下，在会议上提出废除袁世凯与日本订立的“二十一条”，要求将德国在山东诸多权益归还中国。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民间社会的反应，《振先杂稿》中也有所反映。例如，在《浴佛节婺城赛会辞》中，詹鸣铎首先指出婺源县城之浴佛节源远流长，“为谁赛会许参禅，佳节重将浴佛传……分明纸醉金迷地，疑是慈云法雨天，借问故园诸父老，相传习俗几何年。”接着又表示：“不如救国储金急，靡费虚浮奈若何。”他认为：“时中日交涉吃紧，商人为筹救国储金为政府后盾”，值此非常时期，大家应当为国分忧。

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当年冬，詹鸣铎撰有《泛论东南、东北之战事》，其中提及自己曾与儿子讨论其时的战事：“善儿谓上海各报在卢、何势力范围之内，不得不为铺张，实即浙军难占胜利，此言不无因。”他还指出战争对于江南一带的影响：“时松江、嘉兴、嘉善及江苏地方如真茹[如]、龙[南?]翔及浏河、黄渡、安定等处，地方糜[糜]烂，人民遭劫，流离转徙，十室九空。杭省人枉受虚惊，亦大半搬移他处，迁地为良，坐使上海客栈、东洋车生意大盛，江苏拉夫尤甚，贫民受困，苦不胜言。至各处码头，银根奇紧，市面萧条，现水每洋七分渐升至九分，民不聊生，哭声载道，亦云惨矣！”<sup>②</sup>

综观詹鸣铎留下的各类文献，他只是一名秀才，虽然衣食无忧，但多年徘徊于功名与生计之间，亦时感步履维艰。在许多情况下，他对于时代之变革只能是徒叹奈何，内心的躁动显而易见。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詹鸣铎有《述怀》诗数首，其中有曰：

寂坐萧斋对短檠，挥毫聊自诉生平，铎经铸史勤吾事，覆雨翻云厌世情。  
两眼放开天地窄，一声长啸鬼神惊，凌霄有志谁羁绊，行看鹏飞万里程。<sup>③</sup>

在这首诗中，十七岁的詹鸣铎直抒胸臆，对社会和国家皆满怀关切，似乎也憧憬着个人前途若鹏程万里指日可来。詹鸣铎自视甚高：“久怀千里志，驰骤太纵横，欲得孙阳相，时时伏枥鸣。”<sup>④</sup>显然，他自比为志在千里的伏枥老骥，时刻等待着大展身手的有朝一日。光绪三十二年（1906），朝廷议停科举，二十四岁的詹鸣铎无比失落，为此撰有《恨赋》多首，“意泳霓裳会众仙，何期世变忽颠连，一封天诏从空下，万里云程付渺然。从此合投班远笔，何须更着祖生鞭？荣妻荫子封泉壤，期许都休负盛年！”<sup>⑤</sup>在这首诗中，往日的豪情壮志，原来也不过是“荣妻荫子”。这一切，于停办科举之后都化作一片空虚。在心理失衡的情况下，他对于时代变迁充满了负面的情绪，“自外潮激刺，世道凌夷，人欲横于洪流，衣冠沦

①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4。

②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6。

③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1。

④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1。

⑤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1。

为禽兽，地维欲折，天柱将颓”，“西海潮流卷地来，三纲顿尽五常灰”<sup>①</sup>。在他眼里，整个社会可谓礼崩乐坏，天崩地裂。但与此同时，对于此一时世巨变，他又甚感束手无策。詹鸣铎曾在上海的《红杂志》上发表《千难万难一打》：“前清时代，读书应试，千千万万，要想状元，千难万难。近年以来，争买彩票，千千万万，要想头奖，千难万难……贿买议员，到处运动，千千万万，要想当选，千难万难。远东运动，各出风头，千千万万，要想优胜，千难万难。各处土匪，掳人勒赎，千千万万，要想剿灭，千难万难。各省官府，争权夺利，千千万万，要想统一，千难万难。兵即是匪，匪即是兵，千千万万，要想裁撤，千难万难。”<sup>②</sup>该诗对于当时的种种怪现状作了概括性的描述，其中也反映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与无奈。

晚清以来，庐坑村内也有一些人追求新式学问。例如，詹天佑祖籍就出自婺源庐坑，他是最早赴美留学的中国幼童之一，后成为著名的铁路专家。迄今，在庐坑村的一处墓碑上，仍刻有詹天佑的名字。詹氏于十二岁时赴美，光绪七年（1881）毕业于耶鲁大学，荣获土木工程学士学位。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朝学部奏颁《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每年八月考选留学毕业生，优秀者分别给予进士、举人出身。宣统年间，詹天佑因其出色成就，而被清政府授予工科进士头衔。对此，僻处庐坑乡间的詹鸣铎，就作有《工科进士演戏拟对》以示庆贺<sup>③</sup>。此外，《振先杂稿》中还有《贺伯纯洋拔贡》：“宝贵时光文明进步，竞争世界名誉最新。”根据《我之小史》的描述，“村内伯纯，在北洋大学毕业，奉旨着赏给进士出身，改为翰林院庶吉士。捷报到家，村人为之一喜。我回忆癸卯年在郡，与他应童子试，提而复宾。后我人已微幸，他投学堂，分道扬镳，各行其志，今日如此，可谓先我着鞭矣。但他这个翰林，俗称洋翰林，洋货好看，哪及国货的着实？譬如贡缎每尺计洋一元另，洋缎则每尺二角另，货有好歹，价有高低，岂可相提而并论！至于他一生无所表见，只善于掬麻雀，人又称为‘麻雀翰林’，这个头衔却也别致。”<sup>④</sup>对于詹伯纯进入北洋大学学习、最后荣获翰林院庶吉士的头衔，詹鸣铎颇为不屑，他酸溜溜地调侃道：“中学毕业奖励拔贡，与科举时代之明经大不相同，说者谓如洋拔贡，洋货好看，总不及国货之着实，洋学堂、洋学生皆然也，付之一笑而已。”<sup>⑤</sup>对于当时的不少新生现象，詹鸣铎亦颇不以为然。他曾作游戏文章《空心大老官论》：“今夫金丝眼镜、雪茄烟，非大老官之气象耶？宝石戒指、鼻烟瓶，非大老官之玩好耶？夏穿亮纱，冬披狐裘，朝坐马车，夕摆抬[台]面，非大老官之威风耶？入搓麻雀，出打茶会，此吃大菜，彼叫出局，非大老官之场面耶？”<sup>⑥</sup>对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变化，他显得牢骚满腹。

处在这种新旧交替的时代，詹鸣铎在措辞行文中，经常将时尚的新名词嵌入个人的表述之中。他撰拟了不少对子，其中时常都堆砌了诸多的新名词。如《双十节国庆纪念》，灯额用“日月重光”四字，对联则为“江汉起元戎，国庆至今留纪念；河山仍大好，民权发展溯从头”<sup>⑦</sup>。《代鉴堂撰挽庆容婆》：“勤以立家，俭以立业，相逾八秩年龄，爱日庆方长，增进人间幸福；商界有子，学界有孙，竞争二十世纪，慈晖今顿杳，理由天上欢迎。”《又代挽佐平》：“营业资本，惟公振刷精神，权利期挽回，看个人独立方针若何特色；商战竞雄，有子远离家族，噩音惊报告，问社会一般心理谁无感情。”《代质芬撰演戏对子》：“天籁一时鸣，物阜民康，鼓乐共和新气象；霓裳三叠曲，兴高采烈，衣冠光复旧威仪。”这些新名词，在晚清民初充斥于各类报章，而詹鸣铎则将之点缀于古已有之的传统对联之中。

除了婺源庐坑外，詹鸣铎四处游历，到过杭州、石门、安庆、景德镇、上海和苏州等地，每到一处，观赏戏剧，流连花丛，并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一一真实地记录下来。在多年的游历中，詹鸣铎在江南各地见过世面，也接触到一些新的思想。不过，就总体而言，他在思想上仍然极为保守，对于世界的总体看法相当传统。詹鸣铎多次游历上海，对于十里洋场称羨不已。在《我之小史》第十五、十六两

① 詹鸣铎：《清故国学生胡公纯甫德配金太孺人节孝辞（并序）》，见《振先杂稿》卷4。

②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6。

③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3。

④ 詹鸣铎：《（新发现的徽商小说）我之小史》第十八回《接杭电匍匐奔丧，办民团守望相助》，第283页。

⑤ 詹鸣铎：《贺伯纯洋拔贡》，见《振先杂稿》卷2。

⑥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3。

⑦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8。

回，他对上海的法政讲习所、徽宁会馆及沪上的娱乐事业（戏剧、影戏、滩簧、饮食、浴室、花园、东洋戏法、文明游戏园、出品会和运动会等）以及其他的城市风俗文化，皆有颇为详尽的铺叙，从中可以反映出詹鸣铎这个“末代秀才”眼中的上海城市文化：

按上海为中外通商的地方，穷奢极侈，凡出门的，回家都道上海非凡之好，我平日久欲一为游玩，今日来到，如愿以偿。船及黄浦江头，见各种洋轮，各国兵轮，色色形形，触目皆是。傍岸之后，遥望马路之上，车马辐辏……一路之上望见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一时电车、马车、脚踏车、人力车分道扬镳，纵横驰骋，极为兴会淋漓。而外国人汽车一声放汽，其行如飞，尤为异常轻快。洋泾浜一带，高大洋房有三层楼及五层楼，大都飞阁流丹，下临无地，真可谓居天下广居<sup>①</sup>。

想来，文明大都市繁华的街景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詹鸣铎自上海回归乡野之后，那些光电声影、红男绿女，还不时涌现在他的笔端，一一写来，恍若梦境。除了前述的白描之外，他还撰有一首《海上歌》：

曾闻海上最逍遥，一代烟花胜六朝，多人[少]游人述其异，此中够得旅魂销。今朝我亦到此地，果然满目风景异，别开生面非人间。靡丽纷华为第一，行舟初及黄浦滩，洋轮多少贮其间，中式西式形不一……<sup>②</sup>

在上海，詹鸣铎与明清时代的不少徽商前辈一样，耽于“红绣鞋”之恋。在《我之小史》中，他以较大的篇幅，大肆渲染自己的倚红偎翠、醉生梦死，并将十里洋场仍然视作是传统时代常见的城市之兴衰递嬗：“中外通商此一家，五方杂处最繁华，耳之于声目于色，无非世界空花花。君不见阿房初起咸阳府，多少清歌与妙舞，曾几何时都是空，楚人一炬成焦土，到此繁华已到头。春江花月胜扬州，寄言浊世佳公子，乐极悲生休浪游。”他对于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充满了消极与悲观，从中反映出在时代变迁中日益被边缘化的乡绅之无力与茫然。

《振先杂稿》为“末代秀才”詹鸣铎的诗文稿，该书于传统诗文内外，展现出其人的一生行迹——在科举一路中断后的心路挣扎，在乡野桑梓中的开拓经营，以及生意往来与人情酬复的繁杂变化等，呈现出了一个更为丰富的中国社会转型中普通读书人之形象，同时亦可见 20 世纪初期地方社会的种种变革痕迹，这与《我之小史》中以白话文学所呈现出来的内心独白不同，更像是晚清民国社会众声喧哗的小合唱。

（责任编辑：周奇）

## Zhan Mingduo, the “Last Government Student” and the Academic Value of *Zhenxian Zagao*

ZHU Hong, WANG Zhenzhong

**Abstract:** Zhan Mingduo (1883-1931), the last government student of Wuyuan county, was only 49 years old, but in his less than 50 years of career, Chinese society has undergone earth shaking changes. In this era of dramatic changes, Zhan Mingduo not only wrote his autobiography “My Little history”, but also his personal collection of poems and essays *Zhenxian Zagao* and diari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anuscript of *Zhenxian Zagao*, and discusses its academic value from three aspects: business, clan, and the role of squire. It can be seen from this that, as a government student and a Huizhou merchant, Zhan Mingduo had no worries about food and clothing, but he had been wandering between fame and livelihood for many years. During his intermittent travels, Zhan saw the world and came into contact with some new ideas. In the wording of his writing, he often embedded the fashionable new nouns into his personal expression, showing the tendency of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However, on the whole, his knowledge reserve and social insight were still extremely conservative. He was full of negativity and pessimism about the rapid social change, which reflected the powerlessness and bewilderment of the increasingly marginalized gentry in the tide of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Key words:** Huizhou, Wuyuan, Zhan Mingduo, squire, *Zhenxian Zagao* (miscellaneous manuscripts written by Zhan Mingduo)

① 詹鸣铎：《（新发现的徽商小说）我之小史》第十五回《考拔贡文战败北，投法政海上逍遥》，第 237—238 页。

②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 3。